

科学与真理的阶梯

——震旦大学医学院

陈挥, 陈杰

震旦大学是近代上海建立较早的一所高等院校,最初由国人创办,后为法国天主教会管理。然而,与传统的教会大学不同的是,由于受到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的较大影响,震旦大学在其办学过程中,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并以其鲜明的法国教育特色,对包括医学教育在内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1952年秋,随着中央教育部调整高校政令的发布,昔日享有“东方巴黎大学”美誉的震旦大学成为历史,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一起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作为由国人创办、后为天主教会控制的医学院校,在它所走过的四十余年里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并促进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一、一波三折的创办历程

1. 创办初期的曲折

鸦片战争后,上海地区租界林立,为教会学校的创办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在华办学成为西方教会和政府竞相争夺的目标,主要以信奉基督教的英美派和信奉天主教的法派为主。随着列强侵略势力的深入,以英语教学为主的基督教会学校在上海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深厚。为增强在中国社会的认同度,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认为在华创办一所与英美派相抗衡的学校已十分必要。另外,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创办了有别于科举取士的新式学堂,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实用人才,这对震旦大学的建立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903年2月27日,爱国天主教徒马相伯借助于法国天主教会的支持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是印度对中国的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马相伯的办学宗旨是力求把震旦建设成崇尚科学与真理、培养翻译人才的基地。因此,他毅然宣称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构,不是宣扬宗教的地方。由于不符合天主教在华办学的初衷,1904年马相伯被迫辞职。1905年8月,震旦重新开学,李问渔任院长。教会表面上承认马相伯是震旦创办人,捧为董事长,但不让他过问校务。人们把1903—1905年的震旦学院称为“第一震旦”,把1905年后的称为“第二震旦”,以示区别。

1908年,震旦学院在法租界卢家湾扩建新校舍时,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以每亩

400元的价格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购买了103亩土地,此外又把他在英法租界拥有的价值10万银元的8处私人地产全部捐献给了学校。

2. 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

1909年,学校迁吕班路新校舍后,耶稣会任命法籍教士韩绍康(H. Allain)为院长。他参照欧洲大陆学制,把预、本科共4年的肄业期改为6年,设文、理两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开始步上正式大学(Université)的办学轨道,也表达了开办医学院的意向。

1913年,法国里昂医学院的著名教授、里昂科学院院士文森特(Eugène Vincent)博士来中国考察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复强调了法国在中国建立医学院的重要性。为了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文森特博士在这篇文章中还特别强调:震旦是惟一能与同类英语院校媲美的法语大学。震旦是中国惟一的以法语为主的大学。其他学校,英语占主导地位,准备学医的学生则去学习德语。除耶稣会学校外,没有任何地方,法语能作为必修课。如果震旦是惟一能荣耀法国语言的学校,它就值得法国的特别关注。法国不能回避支持这项事业的义务。这是关系到体现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关系到法国在东方的影响,法国在忠诚捍卫世俗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是高贵的义务。我们希望这种观念深入所有的法国人、所有关注法国强盛和法国文明传播的人^[1]。文森特博士的呼吁对震旦医学院的创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陈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史研究室教授,电子邮箱:dangx@shsmu.edu.cn; 陈杰,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电子邮箱:chenjie2045@163.com。

[1] Dr. Eugène Vincent, *L'influence Française en Chine et les Entreprises Allemandes: Nécessité de créer en China une Faculté française de Médecine*, 1914.Fch325, 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转引自王薇佳:《一篇文章和一个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第63—67页。

1914年,南道煜任院长时震旦学院正式设立了医科,学制四年;1915年姚缙唐(Hery)任院长后聘请法国的医学教授来校任教,并把学制由四年改为六年,教学上参照当时法国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教材也以法国的医学院教材为准。

1916年,薛佩礼博士被法国政府委派到震旦学院,主持医科的发展工作,从而使震旦学院的医科向着创办正轨医学教育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私立教会大学的管理。1928年,震旦学院依据国民政府章程,改震旦学院为震旦大学^[1]。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了震旦大学的立案申请,将医科升格为医学院,聘请驻华使馆医师贝熙业(Dr. Bussière)兼任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

1932年,震旦大学常务校董才尔孟提出,中国地大人众,而从事牙医教育只有华西大学牙医学院,因此牙医教育具有广阔的前景。于是,震旦大学医学院决定设立牙医学系,由法国牙医学博士勒乔爱(Dr. Le Goaes)主持该系的筹建工作。1938年,勒乔爱合同期满回国。1940年沈国祚回国,被任命为牙医学系主任。1948年春,牙医学系将学制由四年改为六年,名称改为牙医学院。

3. 涅槃重生,光荣合并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初步改变了中国高校过于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合理的分布格局。1952秋,根据中央教育部调整高校的政令,震旦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在震旦大学原址建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增设内科、外科、口腔三个专修科,学制为三年。震旦大学医科从1914年创办到1952年10月,38年中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共有毕业生581名,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独树一帜的医学教育

1. 坚持法语教学

震旦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用法语教学的高等学校,这是震旦大学最为显著的办学特色,也是法国政府引以自豪和大力支持震旦办学和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法国驻华总领事梅理蒗(Meyrier)在震旦大学25周年校庆时说道:“我代表法国政府与法国人民对你们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赞扬,并对你们在此为传播、发展法国的文化和科学而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你们把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教学方法带给了这些青年,把我们工程师的本领、我国的医学、我们哲学家的才智教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我国文学的杰作,还把我们的法律、法令和宪法中的原则阐述给他们听……你们懂得怎样根据他们的情况,在你们的教学方法中,将培养中国学生与你们带来的法国文化结合在一起。你们进行的这一中法文化

合作事业是值得我们骄傲的”^[2]。从法国政府官员的口中可以了解,震旦大学是法国在中国传播法兰西文化的阵地,这就是它与同时期上海其他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最不同的地方,也使震旦大学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大学而非教会大学。

2. 独特的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学效果,震旦大学在教学中特别注意运用直观的方法,通过观摩实习、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习惯^[3]。解剖学是医学院学生在基础医学阶段学习的重要任务,按规定学生在第二、三学年中有3个学期要安排解剖实习的课时达270小时,平均每日要进行2小时的尸体解剖,这样每个学生才能完成两次全身解剖的实习。这种极其注重实践动手能力的医学授课法在当时的医学院校中实属罕见。

医学院后期学生见习在安当医院(后并入卢湾区中心医院,今为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实习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两所医院病床多、病种多,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操作机会。同时,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医德教育,开设了“医业伦理学”课程,使学生懂得了在正式成为执业医师后必须恪守的医师人格、医师道德和医业秘密等。当学生完成学业时,必须在毕业典礼上当众宣读医学誓言,指引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坚定自己的事业信念,起到激励、鼓舞、自勉、制约的作用。

20世纪初,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姚宗李(法籍)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东侧购买了180亩土地,1906年开始在此地筹建广慈医院,1907年10月13日举行了开院典礼。1914年震旦学院设立医科后,广慈医院成为震旦的教学医院。1916年,法国医学博士薛佩礼来校任教后兼任了医院的内科主任,使广慈的内科逐渐得到发展,影响也不断扩大。此后,震旦大学先后从法国招聘教师来中国任教,并在广慈医院分设了内科、外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电疗科等7个科室。1932年,震旦大学医学院增设牙医专业后,在广慈医院专门建造了一幢牙医门诊部作为牙医系的临床教学基地,成为上海牙科疾病治疗中心。



[1] 《震旦大学建校百年纪念》,震旦大学校友会2002年9月编辑出版,第43页。

[2] 转引自王薇佳:《震旦大学与近代中法教育交流》,《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3] 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东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1933年,法国巴黎大学内科医学博士邝安堃回国,受聘为震旦大学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兼任广慈医院内科主任。1935年,法国里昂大学外科学博士徐宝彝回国,受聘为震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教授,兼任广慈医院外科主任。从而使广慈医院内外科的医疗水平在上海跃居领先的地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广慈医院又聘请了一些专家,并增添了一批年轻的医师。至1949年,全院共有医师50多名,病床780张,成了一所学科较为齐全、远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3. 频繁的考试制度

由于是法国的医学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移植,所以震旦医学院考试制度也模仿法国医学院校,有周考、月考、学期期终考、学年年终考等规定。科目证书考试是学年年终考试的一种:第一、第二学年须得到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目(法文简称P.C.B)证书考试及格;第三至第六学年就有六组科目证书考试,从医学基础到临床各科目共有27门,分期举行考试,主要科目还规定进行笔试与口试。每项科目第一次考试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不及格则需留级。笔试试卷由两位教授分别阅评,口试由考试委员三人分别考问,医科学制为六年,在校六年间,每周六上午规定必有一门学科的考试。每年有一门学科的大考,发给一张证书。六年间要考得六张证书,才能参与最后的毕业考试^[1]。这些重点的考试,均有法国使馆特派人员参与,考试及格后发给法国政府认可的医学学士学位证书。由于震旦实行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震旦大学的学生淘汰率特别高,这也有效地保证了震旦大学具有较高的教学质量,这些医学人才毕业后对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令人瞩目的社会贡献

1. 参加社会爱国运动

民国时期,战祸不断。震旦大学的师生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奔赴前线,抢救伤员,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八年抗战期间,经震旦医学院师生救治的伤兵就有上千人之多。建国后,震旦大学医学院积极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派出了五位老师带领的医疗小队奔赴灾情严重的地区,经过两年奋战,治愈血吸虫病人一千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此外,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其他兄弟医学院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有效地遏制了1951年华东地区出现的天花、鼠疫等流行性传染病,出色完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达的任务,受到社会各界的

大力赞扬。

2. 推动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

震旦大学的医学教育是法国本土医学教育在中国的移植,体现了法国医学教育的办学理念和教学目的,在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中独树一帜,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淘汰率特高,能够坚持到毕业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震旦大学的医学教育虽然只存在短短的38年,却培养了一大批医学精英。这些人才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医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振义、史济湘、杨士达、聂传贤、陈敏章等都是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杰出校友。王振义教授是著名的血液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6年,他在国际首创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为恶性肿瘤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治疗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因此被授予国际上最具有权威性的癌症研究大奖——凯特林医学奖。史济湘教授是灼伤外科学专家,1958年参与成功抢救烧伤总面积达89%、Ⅲ度烧伤面积达23%的钢铁工人邱财康,突破了当时国内外文献所宣称的“烧伤总面积超过80%无法治愈”的界限,先后获国家卫生部的记功奖励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二、震旦大学医学院代表着当时先进的医学教育。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后,震旦大学医学院先进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临床医学经验被完整继承下来,对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很多方面都保留了震旦大学医学院的特色。

第三、震旦大学医学院留下的建筑、医疗设备和实验室等都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硬件设施。震旦大学医学院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震旦大学医学院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一个成功的结合点,是在相互交融和碰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的,实现了两国文化的深层次交流。震旦大学本是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基地,但却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并根据中国社会文化而改变自己,使之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震旦大学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推动民族自觉自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长远的现实借鉴意义。



[1]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震旦大学关于震旦大学医科、法科及理工科的课程计划与考试(中法文)等》,卷宗 Q244-1-756。